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七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65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

统一书号：11072·128

定 价：0.77元

目 录

天津近代城市建筑简史	卢 绳 (1)
缅怀张克忠——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	王端驯 (48)
抗战前的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	仇铁儒 (95)
抗战初期党在天津的抗日活动片断	李启华 (104)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一些历史情况	张致祥 (108)
记天津“工字团”的抗日活动	张秀岩 (114)
回忆沦陷时期天津电话局“抗交”事件	吴云心 (121)
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在抗战期间的活动	郑作藩 (128)
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沽船坞	董振修 张振武 (139)
中兴煤矿经营始末	张叔诚 谈在唐 (146)
天津北方航业公司的兴衰	陈世如 (160)
天津帮经营西大营贸易概述	王金岗等 (171)

理教传入天津及西老公所……………李准贤(189)

我所知道的青红帮在天津的活动 ……………王子晨(206)

天津青帮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胡君素 李树棠(220)

• 补白 •

记南渝中学(94) “南渝”与“蜀光”(103) 天津早期的电话
事业(127) 帝俄军队在塘沽的暴行(145) 大沽驳船公司(170)
洪门反清事迹(205) 青帮的摆香堂(219)

天津近代城市建筑简史*

卢 绳

一、开埠以前的天津(1860以前)

二、天津开埠后租界区的形成及城市建筑面貌的变化(1860—1900)

三、天津租界区的大规模建筑活动,官僚军阀政权大兴工艺及民族资产阶级初期的工业建筑活动(1900—1919)

四、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动荡中,天津城市建筑畸形发展(1919—1937)

五、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建筑事业极度凋敝(1937—1949)

第一章 开埠以前的天津(1860年以前)

(一) 天津城市聚落之起源及其发展

天津城市聚落的早期居民点,始于今天东北角外狮子林桥西南面沿河地区的旧三岔河口(1917年天津大水灾后,顺直水

*此文系已故天津大学教授卢绳先生(1918—1977)的遗稿,写于一九六〇年。本刊发表时,作了一些删节和补正。

利委员会于1918年将南运河裁湾取直，在金钢桥以北与北运河相会，三岔河口随之向北推移）。在地理位置上，正当海河及其五大支流——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卫河（南运河）的汇合之处，其中以卫河流域最广，经济开发最早，航运兴盛，因此其流入海河的汇口河岸一带，自然形成了最初的聚落基点，加以该地区之地势较高，受水患威胁较小，形成定居的有利因素。

天津地区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濒临渤海。市区地势，东北较高，西南低下，附近不见山丘，属于平原地带。地质为含沙黏土，且含碱质。自市区中心向东南到渤海口七十公里，西北到北京一百三十公里，为从海上进入首都之门户。据历史资料记载，天津设卫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此以前，天津地区不过是某些州、郡、县的属地，如周时属幽州及兖州，春秋时属燕，秦改上谷郡；汉时始置县，前后曾隶属于泉州、章武、参户、雍奴、鲁城、长芦等县；唐时置道，又属过武清、乾符、清池、长芦等县。聚落的形成大抵在金元时期，地名直沽；又以聚落的发展，分为小直沽和大直沽。小直沽即旧三岔河口，地当南北交通之枢纽，成为保卫京都之战略要地，金朝建都北京后，在直沽设寨置戍，元朝也屡次派兵驻守。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在小直沽设海津镇；元至正九年（1349年）设镇抚司。小直沽地区的繁盛与盐业及航运业有关。早在南宋时代此地已奉旨煎盐，同时又是运粮的孔道。元朝海运漕粮发达，在直沽设接运厅和海运米仓，由是经济日趋发展。元朝诗人有“晓日三汊口，连樯集万艘”之描述，可见当时航运之繁忙景象。元泰定三年（1326年），皇帝敕建天后宫于东门外，所有经过船只例须入庙祭祷，一时香火极盛。天津之经济地位由是奠定。

（二）天津筑城设卫及一些封建性建筑

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兵下沧州，渡直沽时赐名为“天津”，这是天津得名之始。永乐二年（1404年），设“天津卫”，命工部尚书黄福和平江伯陈瑄、都指挥陈达筑城浚池。当时所筑之卫城，周长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设“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四门，城外有濠。天津筑城设卫后，除派兵驻守外，又调配官军两籍前来居住，从而人口骤增。其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天津遂成为京都通向南方的第一门户，且为四方百货集散之地。自明宣德三年（1428年）起，朝廷在津设关抽税。明弘治四年（1491年），除了保存原有卫的组织外，又设天津道按察副使，辖天津到德州沿运河一带的军政衙门。天津卫城在永乐年间建筑时系土城，至明弘治六、七年间（1493—1494年），经按察副史刘福重修，改为砖石包砌。

清初，天津除为漕运中心外，同时又是长芦盐的主要集散地，从而促使天津迅速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清雍正三年（1725），改天津卫为州，辖武清、静海、青县三县。同年重修城池，位置略向南移。新城修建后，四门易名：东为“镇海”，南为“归极”，西为“卫安”，北为“带河”。雍正九年（1731年）又升为天津府，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州六县。到清道光年间，天津人口已达二十万人，近半数居民住在城内，另有八万人分布在东北城外狭长沿河地带，其余者散居于各门外。由此可见，天津在开埠以前的聚落情况，基本上仅分布于旧三岔河口上下的沿河两岸和旧城区以内。

天津城区的规划具有北方城市的特色，干道十字正交，中建鼓楼。在清代，城里建有镇、道、府、县衙门，还有文庙、城隍庙等祠庙建筑。所有衙门都设在贯通东西的中轴线以北，包括道署、盐运使署、镇署、府署。城的西北角建有城隍庙，这也是一般中国封建城市的惯例。在南面除少数会馆建筑外，都是居民区。城内的小道路北面多是沿着大小衙门的前后左右开辟，南面多为南北走向。旧城之外，在清咸丰八年（1858年）僧格林沁曾筑墙子一道，即后来墙子河沿岸旧址（今胜利路的一部分）。

现将天津封建性建筑文物简单介绍几处如下：

一、楼阁建筑

著名的有鼓楼、望海楼、环水楼和县阁等。鼓楼在旧城中心——东西南北四大街相交处，下起方城，上建重层歇山式楼屋，登临可俯视全城。鼓楼上原有津门诗人梅小树撰对联一副：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鼓楼初建于明弘治年间，后几次重修，解放后因妨碍交通于一九五二年拆除。望海楼、崇禧观、望海寺在东城外三岔河口北岸。崇禧观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法帝国主义强租，改建为天主教堂；后望海楼亦为法国教会攫取。一九一八年海河裁湾取直，望海寺被划入河心，被拆除。环水楼建于清康熙初年。县阁相传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下有砖座一层，中有门道贯通前后，座山建歇山式重楼，楼屋三间，外有回廊。上述建筑今均已不存。

二、祠宇寺庙建筑

清代天津是屏藩京师的重镇，后期又是直隶总督衙门的所在地，清王朝的一些“重臣”被派驻天津，因而立有许多祠宇，

如曾公祠、僧王祠、丁公祠、聂公祠、李公祠等。其中以李鸿章祠较具规模。

寺庙建筑以铃铛阁为最古，在城西北稽古寺中，传说建自唐代，清初重修，光绪年间被焚毁，后改为稽古书院，原建筑已不存。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在东门外，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明代以后几次重修，这可能是天津市区现存的最老的一座木建筑了。玉皇阁在东门外天后宫北，始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海光寺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名普陀寺，殿宇宏敞，环境幽雅，八国联军入侵后为日本人占据，原建筑今均已不存。大悲院在河北西窑洼，始建可能在清顺治年间，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已毁（现在的大悲院建于1940年）。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最著名的是穆庄子清真大寺、河北金家窑清真寺和西北城角附近的四大寺——北寺、南寺、大寺和西寺，其中以穆庄子清真大寺为最古，建于明永乐年间，金家窑清真寺建于明万历年间。

三、学署庄园建筑

在旧城东门内有府学、县学和学署建筑。府学始建于明正统年间，后于景泰、正德年间重修，当时称卫学，清雍正年间改为府学，又于乾隆、嘉庆、同治年间几次重修。县学在府学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尔后多次重修。府、县两学文庙平面大略相同，皆自庙门而北为泮池、櫺星门、殿门、大成殿、崇圣祠，殿东西为两庑。学署有明伦堂、文昌祠。

天津的地主庄园也有不少，最著名的是清雍正朝大盐商查日乾家的花园，名水西庄，在旧城西三里多，位于南运河之南，占地约百亩，乾隆皇帝东巡过津时曾寓居水西庄，并赐名为芥园。园中有揽翠轩、枕谿廊、数帆台、藕香榭、花影巷、碧海

浮螺亭、泊月舫、绣野簃、一犁春雨诸景。水西庄废于清同治年间，至庚子年间又有兵卒驻扎该园，毁坏殆尽。该址现为芥园自来水厂。

以上略述天津开埠前一些较大建筑，可以想见当时天津旧城的规模和布局。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之后，天津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城市，在城区布局及建筑形式上逐渐发生变化。

第二章 天津开埠后租界区的形成及 城市建筑面貌的变化（1860——1900）

（一）外国租界区的形成

清咸丰十年（1860年），由于英法联军的人侵，在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之后，天津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同年，英、法、美相继在天津划定租界，地点在距天津城南六里外的紫竹林一带。考紫竹林也称紫竹庵，是一座观音寺，建于清康熙年间，庵门朝西，面临大道，背靠海河，旧时货商多从这里经过，是通向海口的要道。三国租界沿海河西岸而设，共长六里，其中英租界占地四百六十亩，法租界占地三百六十亩，美租界占地一百三十一亩（后来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内）。当时海河沿岸村落稀少，最早来天津的外国商人及传教士并不在租界内居住，而多住在城内及东门外官北大街一带居民稠密的地区。后来租界开始建造房屋，外国人才逐渐集中到租界里。以上是各国在天津开辟租界的第一阶段。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及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俄、法、德三

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退回中国，德国便以此为由，要求在天津开辟租界，地点在海河西岸美租界之南，占地一千零三十四亩。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日本在法租界西北开辟租界，占地一千六百六十七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租界向西扩张，占地一千六百三十亩，划为英国推广租界。以上德、日在天津开辟租界及英国扩充租界，可称是第二阶段。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在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900—1902年），俄、奥、意、比四国又在天津开辟租界。帝俄首先在海河东岸占地五千四百七十四亩，比利时继之，在俄租界之南，占地一千四百二十七亩；其次为意大利，在俄租界以北，占地七百一十四亩；再次为奥匈帝国，其租界在意租界以北，占地一千一百八十六亩。

英、法、日、德诸国，也借机推广租界。法租界从海大道原界向西推广到墙子河，面积扩大到二千三百六十亩；日本从原界向北推广到南市，面积扩大到二千零六十七亩；英国又第二次推广从墙子河到海光寺大道以西，同时又将美租界并入，共占地六千一百七十六亩；德国从原界向西南扩充，共占地二千四百三十四亩。这是各国在天津开辟及扩充租界的第三阶段。

至此，沿海河东西两岸有了八国租界（原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内）。其中，八国联军入侵前的英、法、日、德各国租界在河西，八国联军入侵后的俄、比、意、奥各国租界在河东。从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天津，疯狂地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活动。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区内，招商购地建房，设立洋行仓库，兴办银行，筑造码头，一面从中国掠夺资源，一面从国

外输入商品，作为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殖民统治的机构及生活享受用房，如领事馆、工部局、警察署、住宅、饭店、俱乐部等，也先后建造起来。

（二）租界的早期建筑

各国在开辟租界初期，未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活动，所建房屋一般均较简易，多系一、二层的砖木结构，房间矮小，质量不高，有些建筑在义和团运动时被焚毁，如马场道的狄克生（J·M·Dichinsons）别墅和旧德璀琳（G·Detring）大楼等。也有些建筑由于质量不高后来被拆除，如法租界内一八六四年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建造的老合众会堂（Old Union Church）。

当时在租界以外有一座比较大的建筑物，就是位于旧三岔河口的望海楼天主堂，建成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由于天津人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掀起反洋教斗争，望海楼天主堂刚建立半年即被群众焚毁。一八九七年望海楼天主堂在原址重建，又于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中被烧。这座教堂虽经几次重建，其基本形象无大变化，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长方形，全楼除塔楼外，大部分具有二层，青砖墙面，门窗为鸡心式，门两侧有扶壁，内部是三通廊式，塔楼上部为平顶，可以瞭望，后礼拜堂的四角也有小角楼。这座教堂具有欧洲哥特式建筑的风格。

望海楼天主堂第一次被烧后，法国天主教会于一八七二年在法租界紫竹林另建一处圣路易教堂（Eglise St. Louis），造型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式样。

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的十年间，英、法租界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这时英租界的干线维多利亚道（Victoria Road，又称中街，今解放北路）开始形成，路的两侧陆续兴建起较高的建筑物。一八八七年，为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五十寿辰，建造了维多利亚花园（Victoria Park），该地原为臭水坑，经填土垫高而建成。一八八九年在花园北侧建造了戈登堂（Gordon Hall），这是为纪念英国侵略中国和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英国军官戈登（C.G. Gordon）而建造的，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铁瓦屋面，青砖墙面，平面为长方形，中间凸出一个门楼，两端有两个八角形的三层角楼，门窗多为尖券式，屋簷作雉堞式簷墙，属于英国中古时期的建筑手法。在花园的对面，于一八九〇年建造了利顺德饭店（今天津饭店），高三层，是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

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间，英租界又陆续修建了许多新建筑，主要有一八九五年建造的英国球场，一八九七年建造的英国医院，以及具有哥特式风格的新合众会堂（Union Church，建于1898年）和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建于1900年）。

这一期间法租界亦出现了一些新建筑，如一八八〇年前后建成的海关大楼（后来几次重修，原建筑面貌已改观，日军占领天津时于一九四一年又扩建一次）。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Mackenzie）来津行医，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支持下，于一八八〇年在法租界海大道建造了伦敦会施医院（后为纪念马根济改名马大夫医院）。该医院是一座歇山顶中国式的建筑，后因改建原貌已不存。

在租界区沿河岸，仓库、码头一类的建筑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当时各国船只来津，多停靠在紫竹林庙前（今承德道

东口),故各洋行在这一带争先建造码头。初期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以后逐渐改建为混凝土结构。

帝国主义入侵天津后,使用了宗教上的麻醉,军事上的镇压和政治上的控制等手段,以达到经济上掠夺的目的,这一点在建筑上有着极为突出的反映。毫无疑义,租界里的高楼大厦都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的。

另一方面,由于西洋建筑技术的输入,对中国建筑在使用要求、形象处理和技术应用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在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天津以前,天津的建筑基本上是继承中国传统的结构方式,采用西洋结构形式的建筑为数极少。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开辟租界以后,西洋建筑大批出现,使得中外建筑技术产生了相互交流,从而使中国的建筑技术开拓了一条新路,如木屋架的改进,钢构架和混凝土的应用,都给我们在大跨度建筑上提供了借镜,在装饰造型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中国的传统建筑技术也促使西洋建筑技术发生某些新的变化,如门窗和簷头采用砌砖来代替做灰线,有的建筑以青砖砌墙红砖做券口形成色彩上的对比,有的在券面簷头上运用天津刻砖技巧等,这就使西洋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甚而还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

(三) 洋务派在天津的建筑活动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见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巨,有利于保全封建统治,镇压人民反抗,于是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产生了一批带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军阀,即所谓洋务派。洋务派以建立军事工业为

主体，从而发展了一些其他企业和进行了一些市政工程建设。这些工业的举办，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建筑，同时也影响到民用建筑。从同治起到光绪年间，天津在“新政”的口号下所进行的建筑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辟道路

天津旧有道路均为土路，坎坷不平，雨后泥泞，交通不便。光绪九年（1883年）津海关道周馥呈请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设立工程总局，抽收码头捐修筑道路。天津修筑的第一条道路是从督院旁浮桥起到紫竹林的一段石路（即从今金钢桥以下至马家口一段沿河马路）。以后又陆续修筑了城内和城外的一些主要街道。

二、市政建设

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成立邮政机构，地点在法租界紫竹林海关附近，名为“华洋书信馆”，后改为“拨驷达信局”，即后来的邮政局。电信设施始于光绪五年（1879年），初自直隶总督天津行署到东机器局，继而通到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其后又与大沽炮台接通，这是中国最早的电报。一八八〇年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在天津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各设电报分局。与此同时，在天津还设立了电报学堂。

三、敷设铁路

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鸿章开办天津铁路公司，官督商办，办理从唐山胥各庄铁路延长到天津的筑路工程，并在天津旺道庄建筑车站。光绪十四年（1888年）津塘铁路通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京津铁路通车。光绪十八年（1892年）改在河东老龙头建筑新车站，即今之东站。

四、军事工业

同治五年（1866年）清廷派崇厚负责筹建天津机器局，地点在天津城南海光寺，于第二年开工，生产枪炮，同时又在天津城东贾家沽建立东局，生产火药。同治九年（1870年），清廷派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进行扩建。自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九年（1873—1893年）经过多次扩建后，规模很大。贾家沽东局有一个机器厂，八个火药厂，二个铜帽厂；海光寺西局有铁厂及办公室、宿舍等房舍三百多间。光绪六年（1880年）在大沽建立北洋水师船坞，除修船外，也进行军火生产。这一期间所建之工厂厂房，一般仍采用旧建筑的形式。

五、创办学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设立北洋大学堂，地址在海大道大营门外梁家园。八国联军入侵后校舍为德国军队占据，乃将学校迁到西沽武库旧址。在此前后，于光绪八年（1882年）建立水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年）建立武备学堂。

六、建筑铁桥

天津由于河流环绕，早期建造之桥梁多为木结构浮桥。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首先将河北大胡同巡盐使署东的浮桥改为铁桥，由英国技师设计的，是天津最早的铁桥，光绪十四年（1888年）改为开启式铁桥。光绪十三年（1887年），位于子牙河北运河汇流处的大红桥也改为铁桥，系单券结构，后于一九二四年大水灾时被冲坍。一九〇〇年以后，各浮桥陆续改建为开启式铁桥。

上述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建筑活动，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式的。

第三章 天津租界区的大规模建筑活动， 官僚军阀政权大兴工艺及民族资产阶级 初期的工业建筑活动（1900—1919）

（一）英、法、日租界大兴土木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甚，列强割据中国的形势已经形成。清王朝逐步走向衰落，直至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在天津的势力有了新的变化。在帝国主义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了新的发展。以上的历史演变，对天津城区的建筑活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天津的八国租界中，从位置、面积及建筑活动来看，以英、法、日三国租界在政治和经济侵略上居于优势地位。如英租界占地最广，历时最长；法租界面积虽小于英租界，但开辟的时间也最早，且租界占据河岸的长度如与其面积相较，则比例最大，这也是在商业上容易取得繁荣的有利因素；日租界开辟虽然较晚，面积也不太大，但其对中国的侵略居于列强中急先锋地位，一九〇〇年以后除向北伸延了沿海河西岸的占地而外，并且在南边租界以外又开设了许多工厂企业，在经济上的掠夺日趋加甚。这些活动在三国租界区的建筑上，也能明显的反映出来。

其他几个租界，俄租界设立于一九〇〇年，虽占地广阔，但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放弃帝俄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中国政府于一九二四年收回俄租界），因而限制了俄租界的发展。意租界在一九〇二年初开辟时，系一片荒丘，地面低洼，